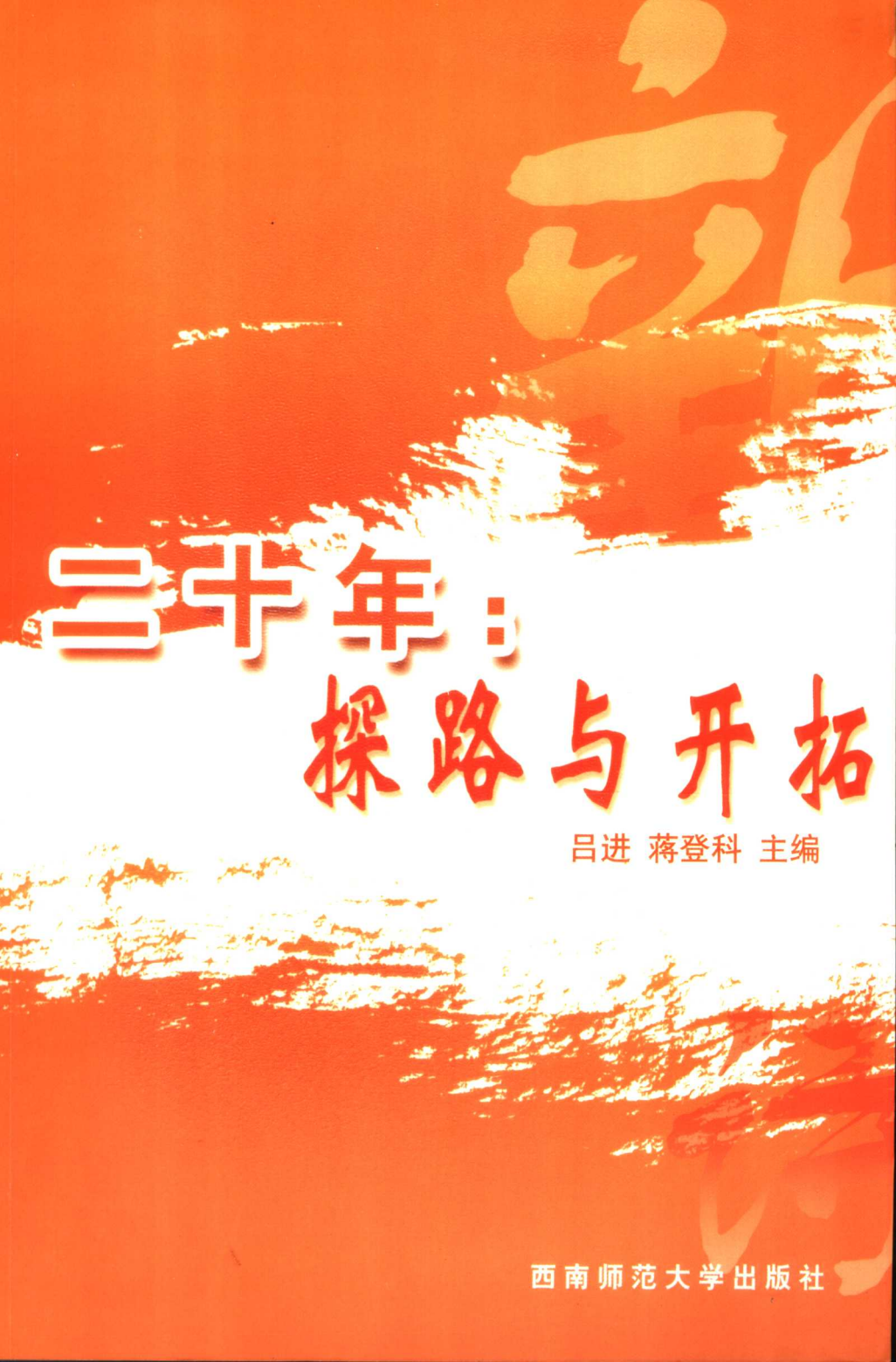




三十年：

探路与开拓

吕进 蒋登科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会委融及向顾

书小主建书局总发行

世

(原非幸)力致送/金

二十年：

探路与开拓

吕进 蒋登科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探路与开拓/吕进主编.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5621-3595-9

I. 二... II. 吕...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6989 号

二十年:探路与开拓

吕 进 蒋登科 主编

责任编辑:钟孝钢

封面设计:王正端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www.xscbs.com

(重庆·北碚 邮编 400715)

印刷者:重庆市九龙坡区圣利印刷厂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41 千

版 次:2006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21-3595-9/G·2266

定 价:18.00 元

二十年:探路与开拓

——序同名论文集

吕 进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①。新诗面临新的生存环境，这里有新的机遇，更有新的挑战。文字的诗的领地在缩小，诗出现了非文字倾向，有了更多种的媒介符号；诗出现了非诗倾向，有了更多元的修辞策略；诗在从平面走向声光，走向立体，有了更多样的解读方式。

有些歌词很诗，有些 MTV 很诗，有些广告很诗，非文字的诗的普及，又会有助于推广文字的诗。有些诗背叛了历史积淀下来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想，非诗倾向的诗丰富着诗的表情能力。站起来的诗、动起来的诗、唱起来的诗，活跃在生活里，立体的诗在寻求更大的舞台。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字的诗属于少数人，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消费。作为高尚的精神滋养的诗却属于广大的同时代者，是大众消费。诗无处不在，诗无时不在。另类文化正在普遍化，亚文化正在上升与精致化，诗歌必须求变。

因此，近一个世纪的现代诗学走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探路，需要开拓。不屑适应舞台，拒绝扩大舞台，就只有走下当代文化的舞台。

在中国新诗研究所建立 20 周年的时候，我们奉献出这本集子。20 年中，中国新诗研究所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这条路让我们迎接过许多风雨，更结交了许许多多的同道的朋友。中国新诗研究所在长期的时间里形成的研究队伍，基本上是博士队伍，这是一支很好的

① [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队伍。他们素质好,潜心于学术,追求高远,不同流俗。入集的论文反映了他们在新环境下的不懈努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里近年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及时地提出新问题,求实地研究新问题,出新地解决新问题,是这支队伍的一贯作风。

祝愿中国新诗研究所在学术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是为序。

目 录

二十年:探路与开拓	吕 进 (1)
-----------------	---------

——序同名论文集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	吕 进 (1)
-----------------------	---------

臧克家:新诗文体建设的重镇	吕 进 (17)
---------------------	----------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吕 进 (37)
-----------------	----------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吕 进 (49)
-------------------------	----------

汉语诗歌节奏的特点	陈本益 (61)
-----------------	----------

——兼与英语诗歌节奏的特点比较

“意”与“象”的重轻之论	陈本益 (72)
--------------------	----------

——中西诗歌意象的一个不同特点及其文化根源比较

康德的审美先验原理试析	陈本益 (82)
-------------------	----------

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	蒋登科 (101)
------------------------	-----------

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文体意识	蒋登科 (110)
----------------------	-----------

论九叶派诗歌中的毁灭和复活话语	蒋登科 (122)
-----------------------	-----------

吕进诗论的学术品格	蒋登科 (137)
-----------------	-----------

“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	向天渊 (145)
---------------------	-----------

从“以中格西”到“以西格中”	向天渊 (155)
----------------------	-----------

——近现代汉语文论话语机制的转换	
膨胀与误读	向天渊(170)
——西方诗学话语的汉化机制	
一次理论的偏航	向天渊(181)
——质疑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有效性	
传播学意义下的余光中诗歌	梁笑梅(186)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及其学科特质	梁笑梅(201)
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与广告的相互诉求	梁笑梅(212)
没有一种爱不是可怕的虚设	梁笑梅(224)
——《中国第4代诗人诗选》对爱情的一种书写	
浅析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写作”现象	熊 辉(234)
试论上园派诗学建构观念的合理性	
及其历史意义	熊 辉(243)
游历中的情思：吕进诗歌片谈	熊 辉(258)
关于现代歌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陆正兰(264)
论歌曲流行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及共同主体性	陆正兰(275)
冰心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探寻	陆正兰(288)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

吕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以抒情诗为中心的中国诗歌历来被看作是文学中的文学。由于诗的辐射与渗透,诗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样,诗论是文论中的文论。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诗论是它的源头和带头学科。一部中国古代文论史基本上就是诗论史。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实现了从抒情到叙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移,新诗在现代文学图谱上的坐标发生变化,现代诗学也面临崭新的理论课题。

中国新诗研究几乎与新诗同时起步。1918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 4 卷 1 期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 9 首诗,通常被视为新诗的最早作品。胡适的著名论文《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被誉为初期新诗研究的“一根大柱”(茅盾)和“金科玉律”(朱自清)。这篇文献写于 1919 年 10 月,比《新青年》的 9 首作品晚了近两年,却比胡适 1920 年 3 月出版的诗集《尝试集》早了近半年,而《尝试集》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个集。

但是,新诗研究在其后的发展并不理想。与古代诗学这座富矿相比,现代诗学一直是一个贫瘠地带。究其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新诗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急先锋。但是由于对“新诗”的“新”的误读,新诗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而理论的发展从来要仰赖理论对象的发展。其二,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理论是中国诗学的现代形态。但是由于“五四”时期开始的对传统文化情绪化的偏激态度的影响,新诗理论与几千年传统诗学基本隔断,造成自身贫血。其三,现代中国长期的战争与动荡的生存环境,使得新诗缺乏自我关照的外在条件。在 20 世纪上半叶,新诗研究只留下了

艾青的《诗论》^①和朱光潜的《诗论》^②等为数极少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它们刚好代表了现代诗论的两种范式：诗人谈诗与理论家谈诗。诗人谈诗的基本出发点是将诗保留为诗，往往是化入诗的内部去谈诗。他是感性的、印象的、经验的，同时又是非体系的、准科学的，诗论往往只是对于他自己读诗时的接受状态的描述。理论家谈诗的基本出发点是将诗化为学术研究对象，往往是站在诗的外部谈诗。他是智化的、演绎的、分析的，同时又是推理的、学理的。诗论往往是对诗的非诗化处理。两种范式的相反相成是诗学的最佳结构。对于中国诗学而言，更缺少的是理论家。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的。

20 世纪下半叶新诗研究的 3 个时段

20 世纪下半叶的新诗研究，大体说来，可以分为 3 个发展时段。

第一个时段，政治论诗学时期：1950～1978。

这个阶段，除了亦门的《诗是什么》（1954 年，新文艺出版社）等极少的专著外，大多数是论文集。有一定影响的如唐湜的《意度集》（1950 年，平原社）、何其芳的《关于写诗和读诗》（1956 年，作家出版社）与《诗歌欣赏》（1962 年，作家出版社）、沈仁康和黄佩玉合著的《抒情诗的构思》（1959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臧克家的《学诗断想》（1962 年，北京出版社）和郭小川的《谈诗》（1978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新的时代，诗人们的共同感受可以用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这个诗句来概括。创造新时代的新诗学，这是共同愿望。创造之路取得了成果，主要表现在使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引进。但是这种引进走向了极端：主要是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这个时期充当主流话语的是政治论诗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政治论诗学恶性膨胀，在“文化革命”中流行一时、危害一时的“武装论”、“工具论”、“哨兵论”

① 艾青. 诗论[M]. 桂林：三户图书社，1941 年初版，后多次再版

② 朱光潜. 诗论[M]. 重庆：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 年初版，后多次再版

是它的自然延伸。

诗歌与政治总是处于无法,也无须割断的内在联系中,并非诗歌只要与政治相联系,就会贬值或毫无价值。在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著名诗人和著名诗篇。尤其是在现代中国,政治是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的现象,也是介入人的生存环境、心灵世界的最强大元素。但是,政治论诗学从阶级论和政党论来定义政治,使“政治”扭曲化和狭窄化;从扭曲化、狭窄化的“政治”来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全部感情生活,将抒人的本真之情与抒人民之情人为地对立起来;只从“政治”维度定位诗歌,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定位于从属关系,忽略诗的文体可能,要求诗负担许多诗外承载。政治论诗学与诗歌相隔膜,很难推动新诗的繁荣。

在这个时期对新诗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何其芳。何其芳对诗的文体特征有比别的同时代人更多的敏感和注意。作为有成就、有文化教养的诗人,何其芳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对新诗的形式建设有所思考。1953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次讲演中,何其芳提出了他的关于诗歌的著名界说。在同一年,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创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何其芳的贡献成为政治论诗学时期新诗研究耀眼的亮点。

第二个时段,观念更新期:1979~1986。

这是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又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新诗研究的转型期。

观念更新期出现的语境,是随着“四人帮”垮台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是思想冲破牢笼的狂欢年代: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无论它曾经拥有什么样的存在理由,都要在新时代的反思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失去继续存在的权利。

新诗研究迎来异常活跃的时期——从对“文革”诗歌的反思渐渐扩展到对“文革”前诗歌的反思,从对历史意义的反思渐渐走向美学意义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主要突破是诗学观念的更新,内核是对诗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认识。

诗歌观念是诗学观念的中心。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从新诗的开山作《女神》（郭沫若，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以降，新诗与生俱来地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庄严的使命意识。在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中，新诗披露民间疾苦，吟唱民族心声，成为除夕将近的空中的凤凰。但是，诗终究是诗，它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在走过了几十年曲折的道路之后，在思想大解放运动之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更新：诗常常是对人的本真存在的歌唱，是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诗与政治的联系只能通过诗的渠道、在诗的文体可能之内实现。在新诗初期，一些新诗先行者从当时的政治出发，单纯强调“白话”，却忽略“诗”，结果，大量“白话诗”只有“白话”而没有“诗”；在后来的长时期内，一些诗人单纯强调“新”，却忽略“诗”，结果，大量“新诗”只有“新”而没有“诗”。“文化革命”是离开诗去写政治的极致，新诗几乎毁灭。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星星》诗刊首先提出了“诗就是诗”的口号，中国的权威刊物《诗刊》发动“诗是什么”的讨论。与传统诗歌同源异貌的朦胧诗的出现，更从创作实践上推动了诗歌观念更新的势头。

诗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诗学观念的另一个中心。

在诗歌观念更新中，诗回到自身；同样，在诗学观念更新中，诗学也回归本位——人们认识到：诗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仅仅是诗；而且，必须从符合诗的美学本质的途径去接近、打量诗歌。虽然政治也不失为诗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诗学不应是政治论文，不应是政策解说，它应当具有科学品质和独立的学术人格。

在这个时期，新诗研究成果很多，探索成为时尚。到了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专业诗评家队列。在过去年代，除了安旗，中国没有专业诗评家。现在，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当时已经知名的诗评家名单：丁力、宋垒、闻山、李元洛、丁国成、陆耀东、龙泉明、尹在勤、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钟文、杨匡汉、阿红、朱先树、袁忠岳、叶橹、杨光治、吕进、陈良运、骆寒超、吴开晋、吴欢章、孙光萱、张同吾、古远清、古继堂、任愆等等。这份名单包括了那些兼写诗评的诗歌编辑，但没有包括为数不少的兼写诗评的诗人。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5年7月更名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1986年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已经出现了专业的新诗研究机构。诗评家们无一例外地参加到诗学观念的争鸣中,其中谢冕颇具影响,他对新的时代趋向和新的诗歌现象的感应很敏锐,长于站在潮头的前头,以时代的标尺考量诗学问题,他的诗论给人的联想与启示就不止于诗歌。1983年,谢冕推出了他的论文集《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

诗学观念更新带来诗学研究重心的移动:由外向内的移动;由客体向主体的移动;由批判向建造的移动;由一向多的移动。

研究视野扩大。在政治论诗学时期,新诗发展史十分单薄,而且越编越薄。诗学观念的更新,使得诗学的研究对象恢复了多姿多彩的面貌,诗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

诗学著述本身的文体革命。诗学著作和学术论文的言说方式和政治论诗学时期拉开距离,不仅学术品质提高,原创性含量增多,而且在语言符号系统的陌生化、新颖化、诗化上实现了自身的文体革命,获得了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文体外貌。

创作方法上的独尊现实主义的一元化诗歌格局消解。在这一时期,中国形成了三大理论群落。以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他们是:传统派、崛起派和上园派。

在政治论诗学时期,传统派的观点在新诗研究领域居于至尊地位。由于没有其他理论群落,所以也没有“传统派”之称。按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丁力在《新诗发展管见》一文中的说法,传统派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派”^①。优秀诗学传统在一代代传承中获得神圣性,在影响社会多数成员的审美趣味和语言理想中获得广泛性。任何时代的诗学都不可能跳出历史的上下文。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诗学传统的批判多于传承,这虽然是转型时期的常见现象,但它也确实是新诗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大地上立足不稳的重要原因。传统派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对传统的理解是静止的(其实,传统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有传统主义倾向,因而多少有点“过去派”的形象,在大变革时代影响有限。

① 丁力.诗歌创作与欣赏[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316.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朦胧诗的争鸣中，另一个诗论群落——“崛起派”登场。崛起派的贡献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理论主张，而在于它是解构中国诗学大一统格局的理论群落。对于新诗研究的打破思维惰性，克服习惯定势，调整感觉系统，开放知识结构，他们起到了突出作用。崛起派的冠名来自这个理论群落的 3 篇论文的标题：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①。以倡导横的移植为主的崛起派，给新诗研究带来某种新的品质。不过，崛起派的根基并不稳靠。因为，在他们的词典里，现代化往往与西化同义，新诗的现代化往往与西方现代派化同义。向西方现代派诗学借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西方现代派产生的文化场横向移到中国的文化场，是一种跨时空的文化转移，这里既有接受，也有本土化的解构和重组。在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断裂中，崛起派表现出偏激与局限。崛起派是一个长于摧毁而不长于中国化的诗学理论的正面建树的理论群落。

在纵横交错点上出现的上园派使得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学格局由二元变为多元。在世界诸多事物的运动中，常常可以看到：当二元对立的时候，“第三”的出现总是起到拓宽思路、活跃全局的作用。在北京上园饭店 1984 年和 1985 年的两次诗学聚会中，一群中年诗评家发现了彼此的相近，决定“揭竿而起”，推出共同的诗学主张。上园派的冠名是在 1986 年。广州《华夏诗报》举行了一次关于诗歌的笔谈，在《编者按》中，该报编者第一次使用了“上园派”的名称，这个称呼后来被学术界所袭用。1987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吕进主编的论文集《上园谈诗》^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上园派诗学。上园派也可以叫转换派，他们像传统派一样主张纵的承传。但是，这一承传是现代对古

①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5-7；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3)；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1)。

② 《上园谈诗》是 7 位诗评家的论文集，入集的诗评家有：阿红、吕进、叶橹、袁忠岳、杨光治、朱先树、朱子庆。吕进在该书《卷末语》中写道：“七位作者的诗学见解接近。这当然完全不是指同一角度、同一层面、同一风格的重复与平行……七弦琴的七根弦奏出各自的乐音，彼此既不会雷同，也不会相互取代。（就是每一根弦，也在变换自己的声音呢！）然而，它们又和谐于同一旋律里。”

代的包容与发现,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应当对传统施行现代化的选择与转换。他们像崛起派一样主张横的移植。但是,这一移植是中国诗歌对外国诗歌的包容与发现,新诗是现代形态的中国诗歌,应当对外国诗歌艺术经验施行本土化的选择与转换。古远清在《中国大陆 40 年诗歌理论批评景观》一文中评述道:“这三大诗论群体两头小中间大,上园派人数较多,且以中年为主。”^①

第三个时段,文体建设期:1987 年起。

1986 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推出“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以“pass 北岛,pass 舒婷”为标榜的“第三代”浮出水面。第三代诗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种年龄划分,而是完全不同于归来者和朦胧诗人的诗歌现象、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像徐敬亚说的那样:“贵族和英雄气息渐次消退,代替它的是冷态的生命体验。”^②“第三代”标志了新时期诗歌的终结,也成为中国新诗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高潮走向退潮。

诗歌的沉寂和从社会生活的中心走向边缘,刚好给新诗研究创造了一个平静而宽松的发展天地。理论的进展总是比创作的繁荣滞后。如果说,新诗最初几十年的基本景观是丰富的创作和贫乏的理论的话,那么,现在的景观恰好相反:贫乏的创作和丰富的理论,后者正是前者此前的繁荣的反响与总结。

文体理论成了中国新诗研究的学科前沿。

考察个中缘由,一是和平、安定的外在环境;二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的新诗又一个高潮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课题;三是国门开放带进许多国外的参照系;四是新诗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得到反思和反驳。因此,当新诗从对历史反思转向对自身反思的时候,文体建设必然地就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中心。

^① 《中国大陆 40 年诗歌理论批评景观》系古远清在世界华文诗人协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收入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

^② 徐敬亚,孟浪,曹长青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2.

如果说,观念更新时期致力于解决诗与政治的关系的话,那么,文体建设时期就是主要在致力解决诗与散文的关系。在诗与政治、诗与散文之间竖起界标,这是新诗诞生以来一直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时代赋予了最好的机遇。

中国新诗文体学的建设在本时期注意了两个对话。一个是与中国古代和近代诗歌文体学的对话;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诗歌文体研究留下的更多的是吉光片羽的精彩之论,如果从学科体系的角度考察,传统诗歌文体学的弊病就显现了——一些常用概念和术语的内涵模糊不定,系统性、理论性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前科学、准科学的性质。然而,从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文本同而末异”始,中国古代和近代诗歌文体理论感悟性强,定位灵活,空灵超脱,创造了丰富的积淀,诸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都是传世之作。中国新诗文体学是现代形态的中国诗歌文体学,与古代和近代诗歌文体学同为中国的诗歌文体学,二者的对话无疑是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必修课。另一个是与西方现代诗歌文体学的对话。中国新诗文体学与西方现代诗歌文体学虽然文化语境相异,但是,它们同为现代的诗歌文体学,现代性将二者的距离拉近。中国新诗文体学是中国诗歌文体学的现代形态,需要站在世界现代文明的水准线上测定自身,与重分析、重体系的西方现代诗学的整合无疑是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又一门必修课。

中国新诗文体学在这一时期致力于两个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类学,即共时性研究。诗与非诗,诗作为多种诗体的存在,诗歌美学,诗体理论,是这一向度的范畴。仅以“现代诗学”命名的著作近年就有吕进的《中国现代诗学》(1991年,重庆出版社)、陈圣生的《现代诗学》(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龙泉明、邹建军的《现代诗学》(200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其次是轨迹学,即历时性研究。新诗的文體轨迹,诗与非诗在发展中的互动,属此范畴。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吕进的《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2000年,重庆出版社)、林焕标的《中国现代新诗的流程与建构》(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周晓风的《新诗的历程——现

代新诗文体流变》(2001年,重庆出版社)对这一范畴有所开拓。

20 世纪下半叶新诗研究的两个基本领域

在 20 世纪下半叶,主要是后 20 年,中国新诗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两个成果相对丰硕的领域:诗人个案研究和新诗文体研究。

1. 诗人个案研究

随着观念的更新,几乎所有诗人都在接受再评价。对诗人的评价已缘不只是局限于他与时代政治的联系,艺术成就不再被回避。一些在政治论诗学时期被“除名”的诗歌流派和诗人也进入研究视野。诗人个案研究大大丰富、也大大提升了。

诗人个案研究的推进和诗歌流派与思潮研究的推进密不可分。近 20 年来,可以说,新诗发展史上的所有流派与思潮都进入了研究视野。钱光培和向远合著的《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198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耀东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198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游友基的《九叶诗派研究》(1997 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怡的《七月派作家评传》(2000 年,重庆出版社)都堪称翘楚。

50 年来,在诗人个案研究中,对胡适、郭沫若、冰心、殷夫、戴望舒、臧克家、陈梦家、朱湘、冯至、冯雪峰、穆木天、蒲风、徐志摩、何其芳、卞之琳、李瑛、郭小川、贺敬之、胡风、阿垅、牛汉、绿原、曾卓、郑敏、北岛、舒婷等等的研究都有进展。尤其是艾青研究、闻一多研究、穆旦研究最有实绩。

中国新诗在诞生后的 80 年间,诗歌创作有 3 个高潮:“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新时期”。第一个高潮的领潮人是郭沫若,而后两个高潮的领潮人都是艾青。艾青是影响新诗半个多世纪的大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生涯始终在成名作的笼罩之下。而艾青却在一生中出现过两次创作青春——从 30 年代初的《大堰河》到 80 年代初的《归来的歌》。在新诗史上,他还应该是自由诗的“第一提琴手”。正因为这样,可以说,艾青研究的状况

往往是观察新诗研究状况的重要视角,艾青研究的水平也是测量新诗研究总体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

艾青研究的重要学者是周红兴和骆寒超。周红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推出的《艾青的跋涉》(198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是第一部艾青的编年史,材料相当丰富和细致。作者花费了7年心血,才写完全书。骆寒超毕业于南京大学,他的艾青研究起步较早,曾因此而获罪。他的《艾青论》(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除了描述艾青的艺术生涯以外,还在与艾青同时代人的比较中推进了对艾青的研究。骆寒超还与方牧、赵午生合编了《艾青研究论文集》(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共收入在1982年举行的“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17篇论文。199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艾青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吴奔星、安娜·布依雅蒂等中外学者共宣读论文58篇。这次会议对艾青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一次检阅。五卷本的《艾青全集》也在会议开幕前夕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艾青研究迄今比较着力的是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演变,他的“散文美”理论及其对中国新诗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他的中后期作品的半格律化倾向,外国诗歌、美术对他的艺术个性形成的影响,等等,都是有待开发的领地。

闻一多研究起步于 20 年代初,主要是对闻一多诗歌作品的艺术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随着闻一多从《红烛》到《死水》的创作道路的拓展,闻一多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位。1948 年开明书店出版《闻一多全集》(1982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郭沫若和朱自清分别为《闻一多全集》写的序言是闻一多研究的有分量的文献。在 1978 年以后,闻一多研究出现了高潮。当“新月”派受到重新评价的时候,当中国新诗研究进入正面建树的时期,闻一多研究的兴起十分自然。因为,闻一多是中国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交叉点上出现的人物。中国新诗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但是对于“解放第二天”的去向,却长期感到茫然。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了第二纪元,他是新诗创格第一人。因此,对于面临文体建设使命的中国新诗,闻一多有着足够的